

翻譯家黎烈文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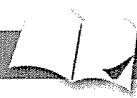
另眼看作家系列之十八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黎烈文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的作家、翻譯家，曾在《申報》主編「自由談」，針砭時弊，鞭撻黑暗，得到魯迅、巴金等著名作家的全力支持。而在抗戰初期，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聘請了郁達夫、黎烈文等著名作家到福建工作。黎烈文在永安組建了改進出版社，創辦了《改進》和相繼出版發行《現代文藝》、《現代兒童》、《現代青年》、《抗戰民眾》、《戰時木刻畫報》6種期刊，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以直接宣傳抗日救亡為主要內容的進步文化活動，並為永安進步文化活動後來迅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郭沫若、馬寅初、朱自清、錢俊瑞、邵荃麟、馮雪峰、何其芳、臧克家、胡風、老舍、巴金、宋之的、羊棗、艾青、艾蕪、唐弢等著名作家、詩人都曾為《改進》刊物撰稿，因此，《改進》深受東南各省和國統區大後方廣大讀者所喜愛。儘管永安是座群山連綿、交通閉塞的山城，但也成了抗戰時期東南半壁的文化中心。這其中黎烈文是功不可沒的。

但到了1958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的註釋卻這麼說：「黎烈文，湖南湘潭人，曾主編《申報》〈自由談〉、《中流》半月刊。後墮落為反動文人，1949年全國大陸解放時逃往臺灣。」對於這條註釋可說是完全歪曲事實，另外黎烈文到臺灣早在1946年2、3月間，是應臺灣光復後首任長官公署陳儀之聘的，絕非到1949年大陸解放後才「逃到」臺灣；至於「反動文人」，更是莫須有的「罪名」。

巴金在〈懷念烈文〉一文中就說：「我記不清楚了，是在什麼人的文章裏，還是在文章的註釋裏，或者是在魯迅先生著作的註解中，有人寫道：曾經是魯迅友好的黎烈文後來墮落成爲『反動文人』。我偶然看到了這句話，我不同意這樣隨便地給別人戴帽子，我雖然多少知道一點黎的爲人和他的情況，可是我手邊沒有材料可以說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來替他講一句公道話，（那時他還活著，還是臺灣大學的一位教授。）這樣，流言（我只好說它是『流言』）就繼續傳播下去，到了『四人幫』橫行的時期，到處編印魯迅先生的文選，註釋中少不了『反動文人黎烈文』一類的字句，這個時候我連『不同意』的思想也沒有了，我自己也給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自己身上給投擲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



友揩掉濁水。所以我的問題初步解決以後，有一次『奉命』寫什麼與魯迅先生有關的材料，談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說據我所知黎烈文並不是『反動文人』。我在1947年初夏，到過臺北，去過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兒子都是我的熟人。黎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的教授，在臺灣大學教書，並不受重視，生活也不寬裕。我同他閒談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參加我們的談話，他並未發表過反動的意見。他是抗戰勝利後就從福建到臺北去工作的，起初在報館當二三把手，不久由於得罪上級丟了官，就到臺灣大學，課不多，課外仍然從事翻譯工作，介紹法國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里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給我編在《譯文叢書》裏出版的。雨田也搞點翻譯，偶爾寫一兩篇小說，我離開臺北回上海後，烈文、雨田常有信來，到上海解放，我們之間音信才中斷。」

黎烈文的好友也是作家的王西彥在〈我所認識的黎烈文〉中說，在1946年的2、3月間，「記得他啓程是在陰曆春節以後，由雨田和我送他上輪船。他預訂的房艙原只有兩個床位，派給他的是臨時增加的一個沙發床。橫靠在艙門的一邊，上面貼了張條子，寫著『黎烈文社長』幾個字。另外兩個床位上是『XXX廳長』和『XXX院長』。頭銜顯然比他顯赫。一看到這情形，雨田臉上難免流露出不愉快的表情。……黎烈文離開福州後，我曾多次到倉前山去看望雨田和她的小女兒。等到黎烈文在臺北找好房子，作了初步安排，她才帶著小女兒渡海東行，時間應該已經是夏末秋初了。」

黎烈文抵臺北之後，受陳儀委託，與李萬居共同主持《新生報》社的工作。李萬居是他留法時的同學，任社長，黎烈文任副社長，兼總主筆。只是這任期只有半年之久，他就「掛冠而去」了。其原因據其弟弟黎烈師給友人的信中說：「那時任臺灣省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夏濤聲，總是盯著他這位『上海鼎鼎有名的左翼作家』，找岔子、挑毛病。」本來陳儀是邀他赴臺灣全權主持《新生報》的言論，不料雖掛了個副社長兼總主筆的頭銜，言論卻全不由他作主，他處處受到當局的掣肘，頭銜形同虛設，因此在1946年的夏末，他就辭去《新生報》的一切事務了。

辭去《新生報》的工作後，他爲了「四口之家」的生活，只得去臺灣省訓練團高級班任國文講師，靠教幾節課餬口度日。他在給好友巴金的信中說：「我也窮得厲害。」再則說：「這半年來在臺北所受的痛苦，特別是精神方面的，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說了。」他還說：「我一時既不能離開臺北，只好到訓練團去教點課……」他又說：「訓練團也混蛋，（信）既不轉給我，也不退還郵局，一直攔在那邊。」

1947年7月，黎烈文應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錢歌川的邀請，任文學院西洋文學系教授，從此開始了他的在臺灣25年的執教生涯。

1947年6月20日至7月中旬，好友巴金來到臺灣，是爲文化生活出版社開辦臺北分社找

房子，這件事情，黎烈文也從中幫過忙。黎烈文在給巴金的信中說：「時局不定，文生社能在臺北弄一個分店，或辦事處作退步，總是好的。兒玉町大學書店斜對面（離以前索非弄的國語函授學社很近）有一所店面房子，地點既好，開間也大，又不要頂費，只要預付一年租金，租金也還公道。這房子是《公論報》的，如果早說，毫不成問題；現在卻有人在搶，我已和李萬慶鬧過幾次，叫他無論如何分一間給文化出版社，現在雖還沒談妥，但大概可以成功，這事陳暉當有詳細的信報告你們。」而巴金在同年8月11日給田一文的信中也談到過去臺灣找房子開辦分社，並派幼弟李濟生去主持的想法：「濟生已去臺北，想在那邊設一分店，不過我看好的房子已經讓別人頂去了，能否找到房子，還難說。我的計畫是從小做起。文生社目前沒有什麼大計畫，年內只想把積稿印出一部分。」

1947年8月間，黎烈文回到上海，他說：「趁著暑假之便，由臺灣去了一次上海，取回十年前寄存在朋友家中的一些衣物、書籍和文稿，其中當然包括《紅與黑》已經譯出的二十餘萬字。」同年8月15日出版的《文藝春秋》第5卷第2期，扉頁有〈歡迎艾蕪·黎烈文〉短文，文曰：「最近，艾蕪先生自重慶來上海，黎烈文先生自臺灣來上海。文藝春秋社在本月10日下午3時，約請了經常為本刊執筆的作家李健吾、許杰、臧克家、碧野先生等作陪，舉行了一次小小的茶聚，以示歡迎。」另外他和巴金還有過歡樂的相聚時光，巴金在〈懷念烈文〉中說：「1947年黎還到過上海，是在我去過臺北之後，住了半個多月，回去以後還來信說：『這次在滬無憂無慮過了三星期，得與許多老朋友會見，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來，我們談話沒有拘束，我常常同他開玩笑，難得看見他發脾氣。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談起烈文，我就說同他相處並不難，他不掩蓋缺點，不打扮自己，有什麼主意、什麼想法，都會暴露出來。有什麼丟臉的事他也並不隱瞞，你批評他，他只是微微一笑。」

1947年5月19日黎烈文給巴金的信中說：「梅里美集的序文，我等訓練團的工作結束後就動手寫，大約下月底可以寄上，總還來得及吧。我以前在《譯文》上譯登過蘇聯盧那察爾斯基作的一篇〈一位停滯時期的天才——梅里美〉（後來曾收入《邂逅草》內），最好能收入梅里美集內作為〈附錄〉，不知你能找到這篇文章不？」。1948年2月，黎烈文翻譯梅里美的《伊爾的美神》，收入巴金主編的《譯文叢書》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王西彥說：「黎烈文也給我寄來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新書，梅里美的短篇小說集《伊爾的美神》。收容在這本新書裡的，除了他在上海和永安時期的舊譯，還有在臺北的三篇新譯，而且附了一篇寫得十分精闢的〈梅里美評傳〉。直到現在，我仍然認為，在對梅里美的介紹方面，這本書是一個值得珍視的貢獻。即使幾經動亂，我手頭依然保留他送給我的幾本譯書，其中《伊爾的美神》的扉頁上，工整地寫著兩行題字，後面一行是『烈文·三十七年三月於臺北』，還在他自己的名字下面加蓋了一個殷紅的圖章。」



曾經是臺大黎烈文的學生的顏元叔教授說：「從大陸來到臺灣，那時我是 18 歲，腦子裡沒有帶來幾位作家，『黎烈文』是極少數的人名之一。……當時，在大陸，差不多的中學生大概都讀過黎烈文的《冰島漁夫》。因此，進臺大外文系時，第一位以文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的，便是黎烈文教授。黎先生當時教的是法文（一）與法文（二）；法文分組授課，也有法籍的神父在教；我和幾位要好的同學，毫不考慮地選了黎先生的法文：他對我們來說，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個里程碑。」

黎烈文關心學生、愛護學生，但是更嚴格地要求學生。顏元叔在〈懷念黎烈文教授〉一文中就說：「有一年暑假，那時和法國還有點邦交，法國領事館送來一批法文書籍，獎勵學法語的學生。黎老師（這是他事後告訴我的）很想把我列入得獎名單，但是，他說：『你就是差兩分，沒有辦法！』辦法是有，你加兩分就得了。他就是不加：愛莫能助的樣子。當時，我心裡也許有點疙瘩，不過很快就消失了。我覺得他做得對。黎老師不是什麼『萬世師表』；不過，像這些小地方，他的做法是個榜樣。」

在繁忙的執教之餘（他先後在臺灣師範學院、政法大學、東海大學和淡江文理學院兼有課程），黎烈文還潛心於他的研究、著譯工作，他比較集中於法國文學方面的譯著，據初步統計，他的譯著有三十餘種。黎烈文是五四以來我國研究法國文學的名家，無論是法國文學作品的譯介水平，還是譯著的數量，至今在我國翻譯界還是無人出其右的。1940 年初，他翻譯的巴爾扎克的長篇小說《鄉下醫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卷首有「吁嗟傷心人，唯有幽與靜」兩句題詞，後來他覺得譯得不妥當，但是書已經出版上市了，他十分悔恨、自責。於是他自己印了一個更正的小紙條，把改進出版社營業所代售的幾十本，請人一一貼上。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盡盡人事！覆貼一本是一本！」問他售出去了、或外地區的怎麼辦？他攤著雙手，顯出無可奈何的樣子。很明顯，因為這個題詞翻譯欠妥，他那翻譯家的良心正受著譴責。那種作法在他來說，似乎是能夠多覆貼一本，他的不安就能減少一分，這正是一個嚴肅翻譯家的態度。

為黎烈文出版《紅與黑》的文壇社老闆穆中南就說：「烈文先生對於譯著的忠實，可以從他的原稿中看出。《紅與黑》除了後四章，在每章文之首都有幾句話，或詩，或名句，或格言，這些東西很難譯，不完全是法文，有時是拉丁文或其他國文字，黎先生都一一的把它譯出，畫龍點睛，啓人省思。如在上卷題丹東的『真實，無情的真實。』真實與無情相聯如何的令人醒目。又下卷題聖·柏甫的『她不美麗，她沒有擦上一點胭脂。』美麗還要擦一點胭脂，看世界是如何的醜陋。除此之外共有 71 個類似短句，有的確是莫名其妙！但黎先生都用心的把它們譯出。又在每章末都有譯者註釋，這都是一般人所不願為的。而黎先生這種忠實的態度，實在令人欽佩。文中偶爾更動一二字，都是煞費苦心的。」

而黎烈文在《〈紅與黑〉出版後記》中就曾痛批作家書屋出版的趙瑞蕪的譯本，說他「錯

誤與刪略之多，不勝枚舉。」「譯者對法文似甚欠了解，因而望文生義，譯文與原著不知差得多遠。且《紅與黑》法文原書有許多版本，稍為講究的都分為上下2卷，上卷30章，下卷45章。普通本則多不分卷，而連接成為75章。趙君不知依據何種版本，在扉頁和目錄上都註明為『上卷』，可是卻翻譯了33章，比一般原書的上卷多出3章；33章以下則毫無交代，序文中亦未說明他這本譯稿是一部未完的譯稿。直到大陸失陷為止，他的《紅與黑》還有42章不曾與世人相見。」黎烈文又說：「《紅與黑》的法文原書，至今已有無數種的版本，我的譯稿所依據的乃是比較晚出的《新法蘭西評論》(Nouvelle Revue Francaise)的『七星叢書』(Bibliothèque de la Pleiade)版。這版本是根據1813年巴黎Levasseur書局所出《紅與黑》的初版排印的。書末有極詳的附註，指出初版與後來1854年經過作者斯湯達爾修改的巴黎Michel Levy書局版的不同的字句。而重要的是：作者斯湯達爾生前曾以《紅與黑》一部送給他的義大利友人布西(Bucci)，那上面又有著作者許多親筆的修改和批註，這部書現在還珍藏於義大利Civita Vecchia市布西後裔的家中。我所依據的『七星叢書』本，曾對照這個寶貴的布西本詳加校訂，作成許多附註印在卷末，以供參考。我翻譯時大都斟酌採用了布西本上的修改。此外我還參照了Lawell Bair的英譯本，桑原武夫與生島遼一合譯的日譯本。英譯本與日譯本雖都偶有錯誤與不妥之處，但遇到困難的文句，它們對我仍頗有啓發的作用。……總之，我譯此書時，縱不敢說力求完美，但至少已力求忠實。……作者斯湯達爾寫成此書時，預料五十年後方有識者；今我譯成此書，希望比斯湯達爾原著有較好的命運。如此書能對中國心理分析小說的發展，提供實質的貢獻，則譯者壯歲執筆，皓首垂成的一番努力就不算白費了！」

1969年11月，黎烈文突患腦血栓症，半身癱瘓。1972年10月31日經長期臥床後，與世長辭了。寂寞身後名，黎烈文的身後顯得相當蕭條，「很少的幾副輓聯和有限的幾隻花圈、花籃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和學生送的。」「他躺在棺木中，蠟黃的面孔似乎沒有經過化妝。……只有少數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著哀傷的臺靜農先生談論黎先生的事蹟。」「黎先生就這樣走了，平日裏他埋頭寫作，不求聞達；死了以後仍然是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好友巴金在〈懷念烈文〉中最後說：「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遙遠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沒有向他的遺體告別，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頭寫作，不求聞達，『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應當是他的遺言吧。」

1973年春，黎烈文的夫人許粵華(雨田)整理其新舊譯著，交由臺北志文出版社出版。計有：《伊爾的美神》(梅里美著)、《屋頂間的哲學家》(梭維斯特著)、《雙重誤會》、《煉獄之魂》(梅里美著)、《魔沼》(喬治桑著)、《脂肪球》、《兩兄弟》(莫泊桑著)、《冰島漁夫》、《拉曼邱的戀愛》(羅遜著)、《法國短篇小說選》(斯湯達爾、左拉等著)、《法國文學巡禮》等。

黎烈師在〈懷念大哥黎烈文〉中說：「大哥！你的長子已是美國化工界有名的權威，次子



已是良醫，女已嫁為人婦，且均有工作，均能承受你的努力讀書的血液遺傳，可以告慰於你在天之靈。」黎烈文的長子黎念之攻「化學工程」，次子忍之攻「醫理學」，女慰之攻「物理學」，均獲博士學位。其中長子黎念之於 1932 年出生於上海，母親嚴冰之在生下他兩個星期後，就因患產褥熱不幸病逝。爲了紀念嚴冰之，黎烈文給兒子取名爲念之。黎念之 1954 年畢業於臺灣大學。1957 年獲美國密歇根韋恩州立大學化工碩士學位。1963 年獲史蒂文斯理工學院哲學博士學位。曾在派克一大衛斯醫藥公司、勞倫斯原子能研究所任職。1960 年被聘爲史蒂文斯理工學院化工系講師。1963 年後歷任埃克森石油公司高級科學家、環球石油公司（UOP）分離科技研究所所長、阿理德—西格諾公司（Allied-Signal）科學與技術研究所所長。

黎念之是膜科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發明的液體膜技術已形成一項重要的技術。他在高分子膜方面亦有卓越的成就。他所研究發明的幾種膜在化工、石油工業、環境保護、資源再生利用、醫藥及生命科學等領域均有應用。他在液體膜及高分子固體膜科學技術領域的傑出貢獻，對化學工程學科及相關學科領域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此外，他在表面化學、化工分離與催化劑研究方面也有卓越貢獻。其著作有 13 部，論文及專利共有一百五十餘篇（項），應邀在美國、中國、日本、歐洲等地作學術演講一百二十餘次，擔任過約六十次重大國際化學、化工、膜科學學術會議主席。1990 年當選爲美國工程院院士。1996 年當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1998 年當選爲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2000 年獲得了被譽爲化學工業界諾貝爾獎的普金獎章（Perkin Medal），他是迄今爲止全球唯一獲此殊榮的華人。2001 年榮獲了世界化工大會授予的終身成就獎。2008 年 5 月 17 日黎念之院士又榮獲美國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JIT）授予榮譽科學博士學位。